

# 香港作為一個全球城市： 社會結構上的轉變與挑戰

呂大樂 余昊昕\*

**摘要：**全球城市的研究主要圍繞三個題目發展起來：第一，世界各個城市在全球經濟中的位置，再而界定哪些城市屬於哪個層次的全球城市；第二，個別全球城市的功能，並且嘗試了解它何以能夠擠身全球城市之列，中間透過怎樣的過程取得這樣的地位；第三，成為全球城市之後的社會後果，特別是移民的生活狀況與收入分佈兩極化的現象。在過去有關第三個题目的討論，多集中於收入兩極化的方面，較少了解全球城市的社會結構。本文嘗試運用 2021 年人口普查的數據，針對上述第三個主題探討香港作為一個全球城市的社會構成，不過討論重點有所調整，由過去已經有很多討論的兩極化問題改為探討全球城市裏中產階級的處境，以深化對全球城市社會結構的了解。

**關鍵詞：**全球城市 社會結構 中產階級 外來專業及經理 競爭強度上升

---

\* 呂大樂，香港教育大學的香港研究學院總監、客席研究講座教授；余昊昕，香港教育大學博士研究生。

香港作為一個自由港、全球城市，跟世界經濟有着密切的聯繫，而它過去的經濟成就及未來發展的重點方向，也離不開這個全球性的面向。所以，香港作為一個全球城市這個課題是一個特別有意思的話題。本文延續作者對這個题目的關注，探討相關文獻中的其中一個主題，就是香港作為一個全球城市在其社會結構上正經歷怎樣的轉變，及因此而引伸的社會含義。

全球城市的研究中，一直圍繞着三個主題：第一，世界各個城市在全球經濟中的位置，以及跟全球經濟的核心活動的連系，從而界定哪些城市屬於哪個層次的全球城市。這類研究的焦點放在勾畫出全球城市的分層結構，將不同城市的重要位置呈現出來。第二，按個別城市的功能，並且嘗試了解它何以能夠擠身於全球城市之列，以解釋如何取得它們作為全球城市的位置。第三，成為全球城市的社會後果，特別是移民工人的生活狀況和城市人口的收入分佈之兩極化的現象。<sup>①</sup> 本文針對的是第三個主題，不過討論重點有所調整，由過去已經有很多討論的兩極化問題，改為探討全球城市裏中產階級的處境，以深化我們對全球城市的社會結構的了解。

## 一、全球城市的社會結構

正如前面所提到，過去有關全球城市研究中第三個题目的討論，多集中於社會的兩極化這個議題上，而較少全面地了解全球城市的社

---

① 參見 Chiu, Stephen W.K., and Lui, Tai-lok, *Hong Kong: Becoming a Chinese Global City*,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1-14.

會結構。這個現象其實並不太難理解，因為以往有關社會結構、階級結構的討論與研究，基本上是以國家為分析單位，鮮有嘗試將焦點移近到城市的層面。而且要分析一個城市的社會結構、階級結構也確實有一定的難度，因為城市跟周邊地區必定會有所聯繫，尤其在資源和人力方面，因流動性強而難以將討論與分析的範圍，局限在一個固定的城市的地理空間裏面。於是，我們經常聽到的是中國的、日本的、英國的階級結構，而較少讀到關於廣州的、東京的、倫敦的階級結構的研究成果。不過，一些研究仍是對個別全球城市的社會結構感到好奇：就以英國倫敦為例，究竟它的社會結構是否走向中產階級化，便有過一些研究和辯論。<sup>①</sup>

事實上，回到全球城市研究的開端，有關研究已經注意到全球城市是高端專業、商業服務的集中地，所以它的社會結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就是高工資的專業人士和經理人員。不過，以往研究更關心的是，正因為全球城市存在一批專業人士和經理人員，於是同時也有數目不少的低工資勞工替前者提供個人服務，而這些個人服務的勞工多數是移民工、婦女勞工，其工資偏低，而且缺乏保障。基於以上觀察，相關的研究對全球城市的社會結構是否呈現兩極化的現象特別感興趣，而有關的討論一直因有新的實證資料及發現而持續辯論。

---

① 關於倫敦的社會結構的辯論，可參考 Hamnett Chris, “The changing occupational class composition of London”, *City*, Vol.19, no.2-3, 2015, pp.239-246; Hamnett Chris, “The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 cities: Professionalisation, proletarianization or polarisation”, *Urban Studies*, Vol.58, no.5, 2021, pp.1050-1066; Davidson, Mark, and Wylie Elvin, “Class-ifying London: Questioning social division and space claims in the post-industrial metropolis”, *City*, Vol.16, no.4, 2012, pp.395-421; Davidson, Mark, and Wylie Elvin, “Same, but different: Within London’s ‘static’ class structure and the missing antagonism”, *City*, Vol.19, no.2-3, 2015, pp.247-257.

不過，由於討論偏重於收入的不平等，以及低下層在經濟發達的全球城市裏的苦況，對於原來的分析中支持着核心經濟活動的專業人士和經理人員，反而未有給與應有的關注。其背後的原因可能是相關研究認為全球城市本身乃是開放的經濟體，只要它們繼續作為跨國公司管理世界性及區域層次上經濟活動的總部，同時又是提供各種「生產性的服務」(producer services) 的集中地，相關的企業、機構便自然會由當地或從世界各地招來人才，令全球城市繼續蓬勃發展。在這樣的假設的基礎上，對處於全球城市階級結構頂部的專業人士和經理人員，研究的興趣便相對不如了解收入不平等、兩極化等題目了。

不過，假如我們換轉另一個角度，從那些仍努力嘗試爬上全球城市分層結構上更高位置的城市來考慮問題，則它們作為全球城市的社會結構上層有沒有持續擴大？由哪些人來出任高薪的要職？這些問題既有學術研究價值，同時又有政策意義。對那些城市政府而言，它們爭取自己的城市成為全球城市，並非以服務跨國資本為最終目標，而是希望從中能惠及當地社會，提供就業和社會結構中高層位置的機會。因此，了解整個城市社會結構的變化，便是一個很實在的問題。

正如前面略為提到，對於整個全球城市的社會結構（尤其是由專業人士和經理人員所組成的部份）的討論與研究，比想像和期望中的少。在相關的研究當中，其中一條研究路徑便是高技術移民和外籍僱員。<sup>①</sup> 理論上兩者並無必然關係，不過在現實之中，由於在全球城市提

---

① 參見 Beaverstock, Jonathan V, "Transnational elites in the city: British highly-skilled inter-company transferees in New York City's financial district",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31, no.2, 2005, pp.245-268; Findlay, A.M. et al, "Skille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global city: A study of expatriates in Hong Kong",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Vol.21, no.1,1996, pp.49-61.

供高端服務的公司多屬跨國企業，他們的高層當中不少屬外籍僱員，享受高工資和優厚的福利補貼。因為是高端人才是全球招聘，不論僱員國籍唯才是用，這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市政府關心這些工種的本地化程度，為本地人才提供機會，也是很合理的期望。如是，全球城市的高端勞動市場的組成，是一個關注點。

而另一條研究路徑是全球城市社會結構的特徵。圍繞着倫敦的辯論，牽涉到如何理解它的社會結構的轉變，而如果有轉變的話，其趨勢又是如何？在此我們不打算詳細介紹相關的辯論，但認為關於整體趨勢究竟是走向專業化還是兩極化，這倒是一個很好的提問，讓我們更深入地了解全球城市的社會結構及其轉變。

## 二、香港：轉變中的社會結構

香港作為一個全球城市既穩固地建立在它長期累積的國際聯繫之上，也受惠於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尤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內地進行的開放改革，不單加快了香港轉向一個服務業為主體的經濟，同時也大大擴充了它的經濟活動規模，令香港通過它的全球聯繫，在財經金融、專業服務、商業服務等各方面均有顯著的發展。

表 1 顯示了在 1991 至 2021 年年間香港經濟活躍人口職業分佈的轉變，當中有兩點跟我們討論的主題相關：第一，香港的中產階級（廣義的界定為以從事經理及行政人員、專業、輔助專業的人士）在整個社會結構所佔的比例有所增加，由 1991 年的 23.2% 到 2021 年的 39.9%。當然，是否所有輔助專業人員都適合歸類為中產階級是有爭議的。如果暫時將輔助專業人員放在一旁而將關注點集中在經理和專業

人員的話，則中產階級的百分比由 1991 年的 12.9% 增長至 2021 年的 20.9%。換言之，即使採用這個較為狹窄的中產定義，這個階層於期間仍有令人矚目的增長。這樣的增長幅度是否可以稱得上是大轉型，相信不同的研究會有不一樣的結論，然而大致上仍可以說是存在一種中產階級化的趨勢。而在走向中產階級化的過程中，跟生產活動相關的職業（如工藝及有關人員、機台及機器操作員、裝配員）顯著收縮，由 1991 年的 28.2% 下降至 2021 年的 10.0%，這個轉變反映了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發生的去工業化和工廠北移。

表 1 香港的職業結構，1991—2021 年 (百分比)

職業 \ 年份	1991*	2001*	2011 <sup>^</sup>	2016 <sup>^</sup>	2021 <sup>^</sup>
經理 +	9.2	10.7	10.3	10.3	9.7
專業人員	3.7	5.5	9.0	9.8	11.2
輔助專業人員	10.3	15.3	17.4	18.2	19.0
文書支持人員	15.9	16.3	15.6	14.2	13.7
服務及銷售人員	13.2	15.0	18.4	19.4	18.2
工藝及有關人員	14.7	9.9	7.3	5.6	5.7
機台及機器操作員、裝配員	13.5	7.3	5.1	4.4	4.3
非技術人員	18.5	19.5	16.7	18.1	18.2
其他	1.0	0.4	0.1	0.1	0.1
總數	100.0	99.9	99.9	100.1	100.1

數據源：統計處 <https://www.censtatd.gov.hk>，多年人口普查數據。

註：\* 按 1988 年國際的職業標準分類整理；<sup>^</sup> 按 2021 年普查所採用的分類處理；+1991 及 2001 年的分類為經理及行政人員，跟 2001 年之後有所不同。

不過，表 1 也顯示出香港的非技術人員一直佔近兩成（16.7%—19.5%）的比例。一個全球城市的中產家庭需要各種個人服務，其中包括聘用家庭傭工。香港的情況是主要來自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的家庭

傭工協助數以十萬計的家庭處理家務，包括照顧老人和幼兒。表 2 的數據進一步表明非技術人員在實際數量上未有減少，在 2011—2021 的十年間增加了七萬五千人。所以，香港作為一個全球城市，它的社會結構雖有中產化趨勢，但卻未能減少在結構底層的非技術人員。基於香港的特殊處境，它沒有辦法像其他全球城市般於空間分佈上將低下階層遷離出城市的範圍。在這個城市裏，低下階層繼續維持着一定的比例。

表 2 香港的不同職業於人數上的轉變，1991—2021 年

職業 \ 年份	1991*	2001*	2011 <sup>^</sup>	2021 <sup>^</sup>	2011—2021
經理 +	249,247	349,637	366,537	356,320	-10,217
專業人員	99,331	179,825	320,767	412,999	92,232
輔助專業人員	279,909	498,671	617,327	698,462	81,135
文書支持人員	431,651	529,992	553,573	502,599	-50,974
服務及銷售人員	359,319	488,961	653,490	668,831	15,341
工藝及有關人員	397,992	321,000	259,898	208,755	-51,143
機台及機器操作員、裝配員	365,826	238,666	180,795	157,870	-22,925
非技術人員	503,832	635,393	592,832	668,724	75,892
其他	27,996	10,561	2,562	6,735	4,173
總數	2,715,103	3,252,706	3,547,781	3,681,295	133,514

數據源：統計處 <https://www.censtatd.gov.hk>，多年人口普查數據。

註：\* 按 1988 年國際的職業標準分類整理；<sup>^</sup> 按 2021 年普查所採用的分類處理；+1991 及 2001 年的分類為經理及行政人員，跟 2001 年之後有所不同。

### 三、社會結構的變化：替代？還是競爭強度的上升？

過去有關全球城市社會結構的討論，其局限在於過於關注社會兩

極化的假設。無可否認，那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在響應學術的探討之餘亦有一份對民生福祉的關心。然而假如我們就停留在這樣的探索範圍，則很容易會忽略了其他同樣重要的議題。<sup>①</sup> 前面簡短的討論指出，香港作為一個全球城市有中產階級化的趨勢，但同時它的底層（尤其是非技術人員）卻未有任何收縮的跡象。這樣的一個社會結構圖案明顯地反映出社會經濟差距的存在，其他可供參考的統計數字亦確認收入不平等依然是這個城市的嚴重社會問題，<sup>②</sup> 不過整個轉變又不能完全以兩極分化來表達。

表 2 的數據提醒我們，香港在中產階級化的同時，亦會因為經濟產業結構的變化而出現經理人員有所減少的現象（2011—2021 年間人數下降了一萬多人）。在香港所見得到的中產階級化，主要是由專業人員和輔導專業人員的增長所驅動，而愈來愈多工商機構採用靈活彈性組織及管理，減少了中層管理人員的職位，令中產階級的職業有加有減。

同時，非技術人員繼續在城市人口中佔有一定的比例，並且到了 2021 年增加至六十六萬多人，但其增長亦非逐年遞增，而是有上有落（見表 2）。要更深入解一個全球城市的社會結構，我們需要將整合的統計數據分拆開來，按提出的問題作出更深一層的分析。基於這樣的考慮，我們向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索取之前未有公開發表的人口普查數據，以便更深入了解在從事經理、專業和輔助專業工作的人士當中，

---

① 關於兩極化作者曾經作過分析，參見 Chiu, Stephen W.K., and Lui, Tai-lok, “Testing the global city-social polarisation thesis: Hong Kong since the 1990s”, *Urban Studies*, Vol.41, no.10, 2004, pp.1863-1888.

② 立法會改革扶貧政策和策略小組委員會，精準扶貧策略，立法會 CB (2) 349/2023 (01) 號文件，2023 年 4 月 28 日。

不同出生地（香港本地出生、內地新來港人士和其他地方新來港人士）者的就業狀況。我們感到好奇的問題是，很多人期望香港繼續鞏固其作為全球城市的地位，因為這樣可以為市民，尤其是年輕人提供晉身經理、專業和輔助專業的機會。但實際情況如何如此，是一個實證問題，需要從統計數據中尋找答案。

可以想像，當我們觀察到全球城市的社會結構出現轉變時（無論是中產階級化，還是結構的底層由婦女勞工和移民工所組成），當地的政府官員和民眾都會想知道長期在該城市生活的市民如何在發展過程中受惠。過去相關的研究較少提出這類提問，相信是因為全球城市乃是開放的經濟體，恆常地需要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以配合各種跨地域管理工作、專業服務的需要。可是，每個城市都需要響應它們當地的市民的要求，希望經濟發展也能給他們帶來機會，過更好的生活。

圖 1 交代了 2001—2021 年間在香港出生的居民的職業分佈，可以發現經理這職業的比例頗為穩定，一直在 11% 左右；取得專業職位的人士由 2001 年的 7.0% 上升至 2021 年的 13.6%；至於輔助專業，在 2021 年佔比位 23.0%。在本地出生的人口中間，能夠取得廣義中產職位的比例在 2001 年為 38%，於二十年間上升至 2021 的 47.9%。一方面，本地出生人口能夠成為中產階級的比例持續上升。但另一方面，除了經理職業之外，本地人在專業和輔助專業兩個職業中的佔比則由約八成降至到約七成五。嚴格來說，以上統計數字未足以顯示本地出生的中產階級已被外來人才所替代，但明顯地他們的處境已有所改變，2006 年以前的上升趨勢已被逆轉，本地人要晉身中產的競爭過程已較以往激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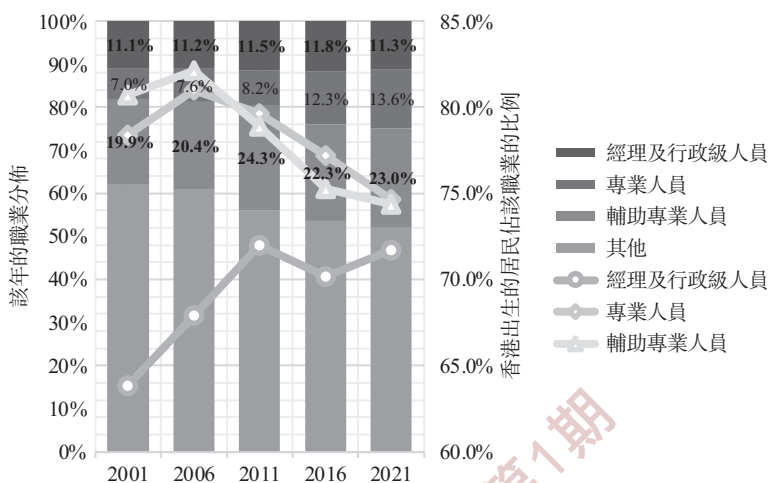


圖 1 香港出生的居民的職業分佈及他們佔該職業的百分比：2001—2021

數據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

他們所面對的競爭部分來自內地新來港人士。2006—2011 年的統計數字顯示，內地新來港人士的組成開始發生變化。以前內地新來港人士的既定形象是屬於家庭團聚背景，教育水平不高，但隨後通過婚姻來港，又或者外派來港工作人士的社經背景、工作崗位以至人數均發生了轉變。2001 年內地新來港人士中只有一成多擔任中產職業的工作，到 2021 年已接近四成（見圖 2）。由於他們在人數上難與本地出生的人口相比，所以就算有顯著的增長，其佔經理、專業、輔助專業各職業的百分比還只在 2% 上下。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在中產職位的勞動市場裏只佔一個很少的比例，很難說已經構成取代本地人才的情況。呼應前面所講，情況更適合形容為逐漸可以令本地人感受到競爭已經存在。

至於來自其他地方的居民，他們的組成長期有別於本地勞動人口，同時也明顯地跟內地新來港人士有所不同。他們數量不多，但在 2021 年時八成從事中產職位（見圖 3），其構成主要是少數的外籍專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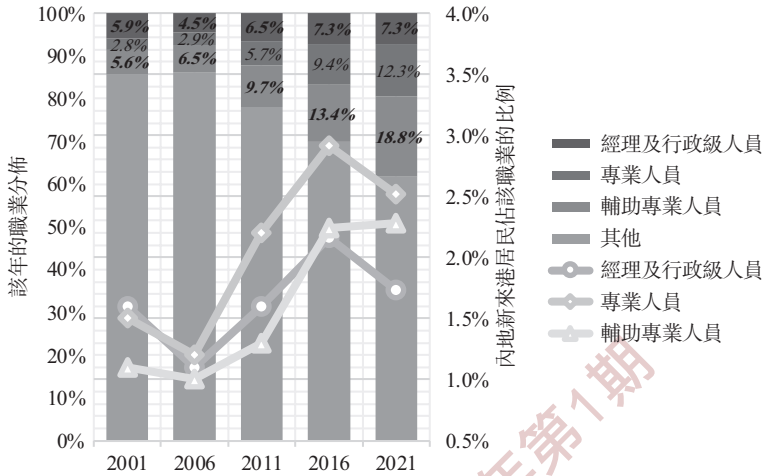


圖 2 內地新來港居民的職業分佈及他們佔該職業的百分比：2001—2021

數據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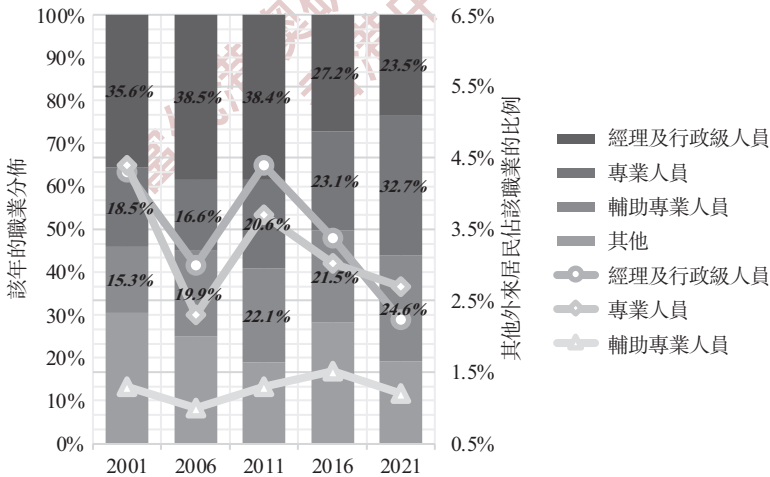


圖 3 其他外來的香港居民的職業分佈及他們佔該職業的百分比：2001—2021（不包括外來家庭傭工）

數據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

由企業及其他機構主動從外國招聘到港。這部分人屬於穿梭於世界各個全球城市的高層管理及專業人員，得到較好的薪酬、待遇是意料之內。而對很多全球城市而言，能否從世界各地吸引專才到來支持高端專業及商業服務，往往被視為該城市發展的指標。這些外來的經理、專業人員的存在可以說是所有全球城市的特徵之一，考慮的問題主要倒不是他們佔多少比例（圖 3 顯示在經理、專業、輔助專業三個職業的比例均低於 2001 年的水平），而是在發展過程之中，本地的專才是否逐漸也能夠扮演他們的角色，協助城市繼續發揮全球或區域管理、營運的功能。

企業及其他機構招攬這些外來專才到港，無論是出任經理還是專業或輔助專業，他們的月收入普遍高於本地出生的和內地新近來港的僱員（見圖 4—6）。而大致上除經理之外，最高收入的是外地新來港人士，本地僱員次之，而內地新來港的僱員收入則相對較低。值得注意的是，回應前面提及的一點，儘管外地新來港專才的待遇一直較其他人優厚，但差距已逐漸收窄。與此同時，2006 年起內地新來港經理的每月工資中位數已超過香港本地經理，而本地人士能保持優勢的職業則是在專業和及輔助專業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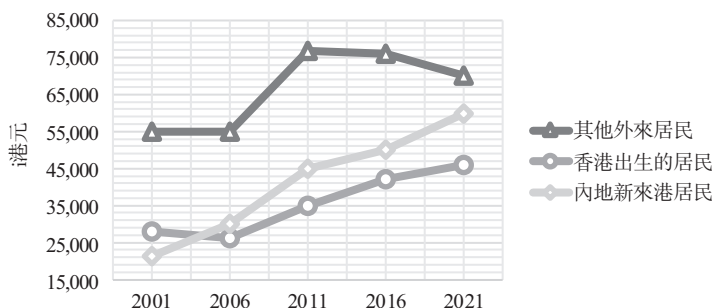


圖 4 不同背景的經理及行政人員的每月收入中位數：2001—2021

數據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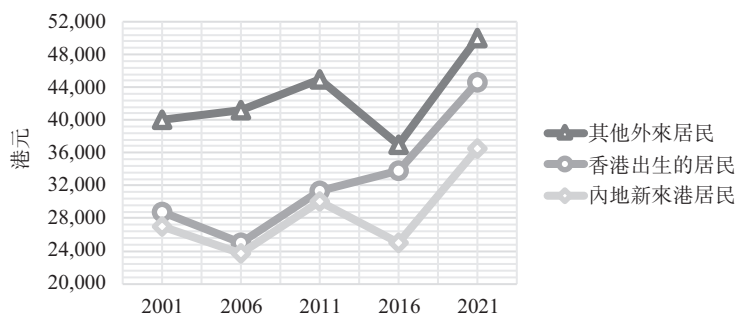


圖 5 不同背景的专业人員的每月收入中位數：2001—2021

數據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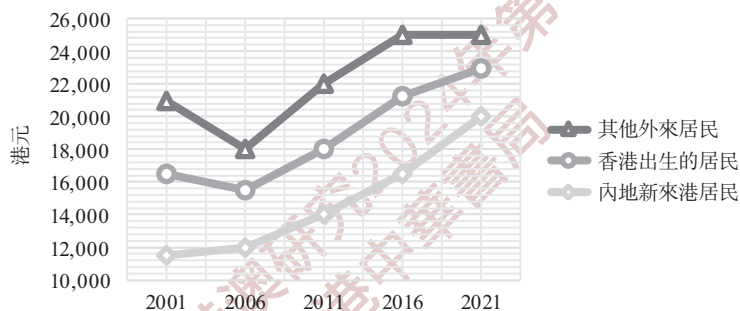


圖 6 不同背景的輔助專業人員的每月收入中位數：2001—2021

數據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

為了更深入了解不同職業當中是否存在內部差異，我們再向統計處索取按年齡（35 歲或以下、36 歲或以上）劃分同一職業內的兩個年齡羣。這個劃分的方法或嫌粗略，但大致上可呈現出處於事業發展初期（大概是工作經驗未到 15 年）和較成熟階段（大概是工作經驗滿 15 年或擁有更多經驗）的兩類人士，以幫助我們了解不同年齡羣所身處的處境差異。在經理人員方面，前面較概括的討論基本上足以說明整體和不同年齡羣的情況，在此不再贅述。

在前面我們曾經交代過不同背景專業人士的每月收入中位數，從

整合的數字來看，香港出生的專業人士跟內地新來港者比較，在 2011 之後似乎便有了明顯的優勢（見圖 5）。可是，當我們將他們分拆為兩個年齡羣的時候，情況便不一樣了。對較年輕的專業人士而言，內地新來港人士的收入早在 2006 年已趕過了本地出生者，到 2016 年則出現扭轉，而到了 2021 年兩者基本沒有太大的差異。至於年齡在 36 歲或以上的專業人士，內地新來港者的月收入要到 2011 年才超過本地出生的專業人士，而之後兩者的每月收入中位數已很接近（見圖 7—8）。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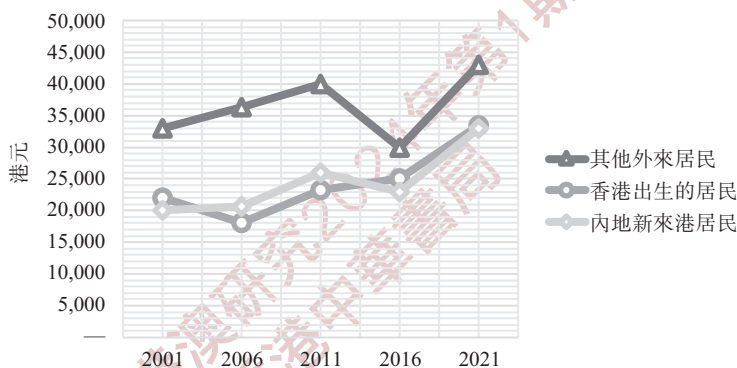


圖 7 35 歲或以下專業人員的每月收入中位數：2001—2021

數據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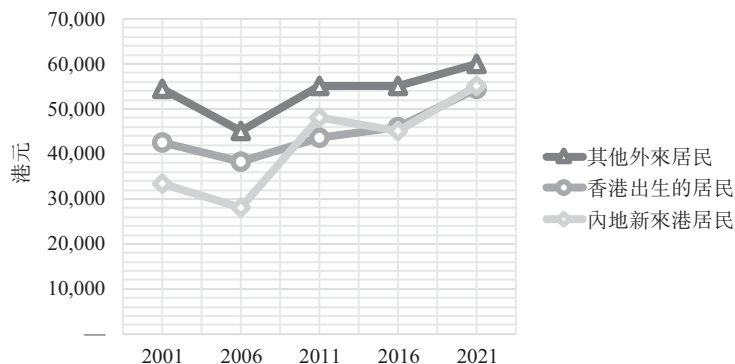


圖 8 36 歲或以上專業人員的每月收入中位數：2001—2021

數據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

們未有足夠的數據來解釋以上情況，但可以想像，隨着內地經濟在開放改革後進一步加速發展，香港所提供的專業、商業服務除建立在專業訓練之外，亦需要具備對國情的了解。香港所需要的外來專才不再局限於傳統的海外專業及管理人員，而是也包括在香港或其他國家受訓的內地專才。他們選擇來港工作各有不同的考慮，而合理的工資、待遇應該是其中之一項誘因。

輔助專業的情況略有不同。一方面跟前面所講有點相似，年輕的本地出生的輔助專業人士到 2006 年便發現他們的每月收入中位數大致上跟內地新來港人士相約。另一方面，在 36 歲或以上的輔助專業人士之中，本地出生的人士則一直保持優勢（見圖 9—10）。內地新來港的輔助專業人士只要能夠取得相關的學歷、資格，基本上所能獲得的薪酬和待遇跟本地輔助專業人士沒有差異。當然，這並不表示內地新來港的輔助專業人士與本地出生的輔助專業人士在客觀條件上要取得所需資歷沒有分別，但入職後的待遇則可能差異不大。至於後者，較年長的新來港人士未必具備完全相等的學歷和資格，以至入職後的收入可能會稍遜於本地出生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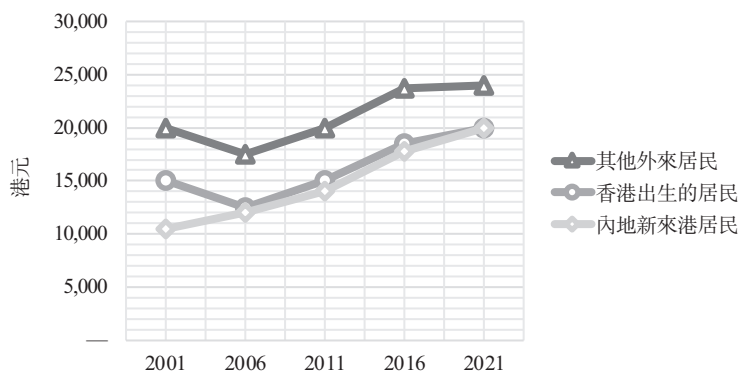


圖 9 35 歲或以下輔助專業人員的每月收入中位數：2001—2021

數據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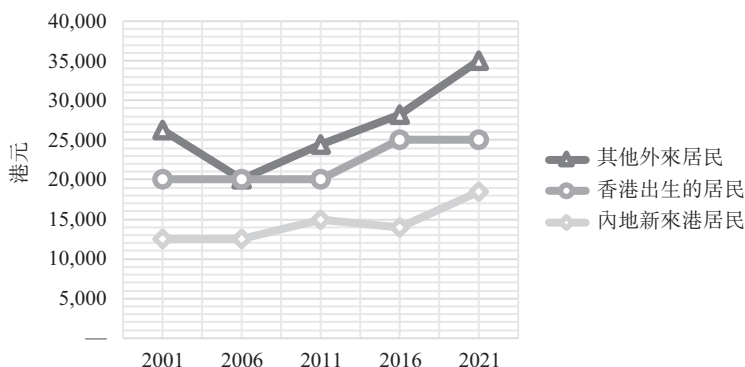


圖 10 36 歲或以上輔助專業人員的每月收入中位數：2001—2021

數據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

總結以上基於人口統計資料的觀察，我們暫時仍未有看見本地出生的經理、專業及輔助專業人士大規模被外來專才（無論是內地來港或來自其他國家）所替代。在數量上，非本地專才只佔少數。在收入上，外來經理、專業及輔助專業人士的待遇仍顯著地優於本地及內地來港的專才。而本地與內地新來港專才間的競爭則有所強化，內地新來港專才在數量上並不多，但薪酬和待遇已逐漸跟本地專才看齊。

## 討論

香港作為一個全球城市，它的經濟活動不可避免地要保持對外開放，在資本流通方面如此，在人才勞動市場方面亦如是。要繼續成為跨國投資的管控中心，以及高端專業和商業服務的集中地，香港需要凝聚世界各地的專才。香港所需要的人才是因應經濟功能與相關活動而有所變化，在這個意義上，香港如何從外與內兩方面去不斷豐富其人才庫，乃是長期且十分重要的工作。不過，任何城市的政府都需要在維持長期的競爭力之餘，也要考慮如何為本地居民提供就業和社會

流動的機會。怎樣在創造高端職位的同時，又能夠讓本地居民，尤其是年輕專才也獲得這些職位的機會，這是一個需要處理的問題。

從一個較長的歷史角度來看，今天在香港所見到，本地出生的專才佔經理、專業及輔助專業這三個中產階級職業七成以上的百分比，是一個發展過程的結果。曾幾何時，外籍專才佔據一個較高的比例，而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本地化的現象，其實可以視為一種替代。在香港轉型成為一個全球城市的過程中，同時又可以有大量本地專才承接各種高端的專業和商業服務，這不單只創造了中產階級的職位，也讓本地居民有機會享受相關的發展成果。當下的問題是往後的發展是否可以帶來同樣的機會？如何讓本地居民分享這些機會？

但正如前面所提及，香港作為一個全球城市必須開放它的人才市場，按經濟發展而吸納海外專才，而同時也需要培訓本地人才。從某個角度來看，本地專才亦難免要面對因競爭而有可能被替代的問題。更積極地面對這項挑戰，是不斷強化香港作為一個全球城市的競爭優勢，並且拓展各種專業和商業服務，例如香港在資產管理業方面近年就保持持續增長（見表 3）。

表 3 資產管理業發展狀況：2005—2020

年份	資產管理業公司數目	就業人數	人均增加價值（萬港元）	佔本地生產總值（以要素成本計）
2005	189	3,583	226	0.86%
2008	380	6,732	258	1.28%
2011	551	7,796	215	1.02%
2017	640	9,425	220	1.00%
2020	753	10,263	250	1.25%

數據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 <https://www.censtatd.gov.hk/en/EIndexbySubject.html?pcode=FA100086&scode=570>.

註：人均增值以資產管理業及從銀行的資產管理業務所得合計。

從表 3 可見，資產管理業在 2005—2020 年間，無論在公司的數目還是就業人數均有顯著增長。在人均增加價值及對本地生產總值貢獻方面，成績是否可以更進一步，這是可以討論的。要鞏固及持續發展香港為一個全球城市，就必須繼續找到新的發展動力。不過，當我們的關注轉到香港「總部經濟」(headquarters economy) 的發展狀況時，則不難發現，擺在面前還有多種挑戰。<sup>①</sup> 圖 11 展示了 1991—2022 年間有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數目，如果將地區總部、地區辦事處和當地辦事處三者一併考慮，那似乎發展狀態良好。可是，當地辦事處只負責香港事務，它們的增長很大程度反映出內地企業和機構更多業務在香港進行而已，而地區辦事處的功能亦只限於協調區內業務運作，未真正算得上是「總部經濟」的核心。「總部經濟」的重要部份在於地區總部的營運。圖 11 的統計數目顯示，駐港的地區總部由 1991 年的 602 間增長至 2019 年高峰的 1541 間，但往後三年均錄得下跌，到 2022 年只有 1411 間。同樣重要的是，從圖 11 可以發現，香港地區總部的增長早在 2006 年左右已到達一個瓶頸，再無一種跳躍式的發展。而香港要保持它的全球城市地位，其中一件重要的工作是維持作為跨國公司在區域內營運指揮的中心。明顯地，香港目前的表現是略為停滯不前，有待改善。而需要改善的不僅是增加地區總部的數目，同樣重要的是活躍和多元的國際聯繫。

我們要指出的問題是，作為全球城市的香港不容自滿、怠慢，必須不斷嘗試在轉變的世界經濟中，以其競爭力來尋找發展的空間。香

---

① 有關討論參見 Lui, Tai-lok, “Still in command and control? Hong Kong’s headquarters economy in the changing global and regional context”, *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 Vol.28, no.5, 2022, pp.641-6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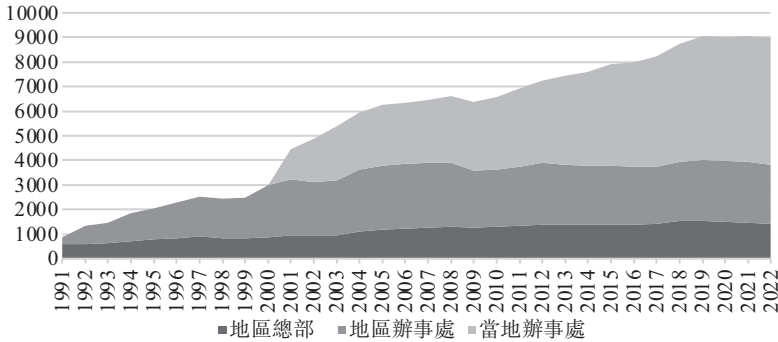


圖 11 有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1991—2022

數據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 [https://www.censtatd.gov.hk/en/search.html?prod\\_type=all](https://www.censtatd.gov.hk/en/search.html?prod_type=all).

港需要這些空間來創造更多高端服務的工種和就業機會，這些機會將繼續推動社會結構的中產階級化，而同樣重要的是這樣才可以滿足本地專才的期望，在一個活躍的就業環境裏與來自內地及世界各地的專才共建一個活力十足的全球城市。

## Hong Kong as a Global City: Changes in Its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Emerging Challenges

*Tai-lok Lui, Haoxin Yu*

**Abstract:** Global city research evolves around three key topics: a) the location of cities in the world economy and a classification of these cities into different tiers of global cities; b)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functions of individual cities and an analysis how these cities are able to attain their positions in the global urban hierarchy; and c)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becoming global cities, especially issues concerning the conditions of the migrants and the phenomenon of income polarization. Previous studies related to the third topic focus on the question of social polarization, and few attempts were made to examine a global city's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 Drawing upon statistical data of the 2021 Census, the authors try to analyse Hong Kong's social structure. Instead of focusing on the issue of polarization, they examine the situa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offer a depiction of broader structural social changes.

**Keywords:** Global city; social structure; the middle class; non-local professionals and managers; intensification of competition

當代港澳研究2024年第4期  
香港中華書局